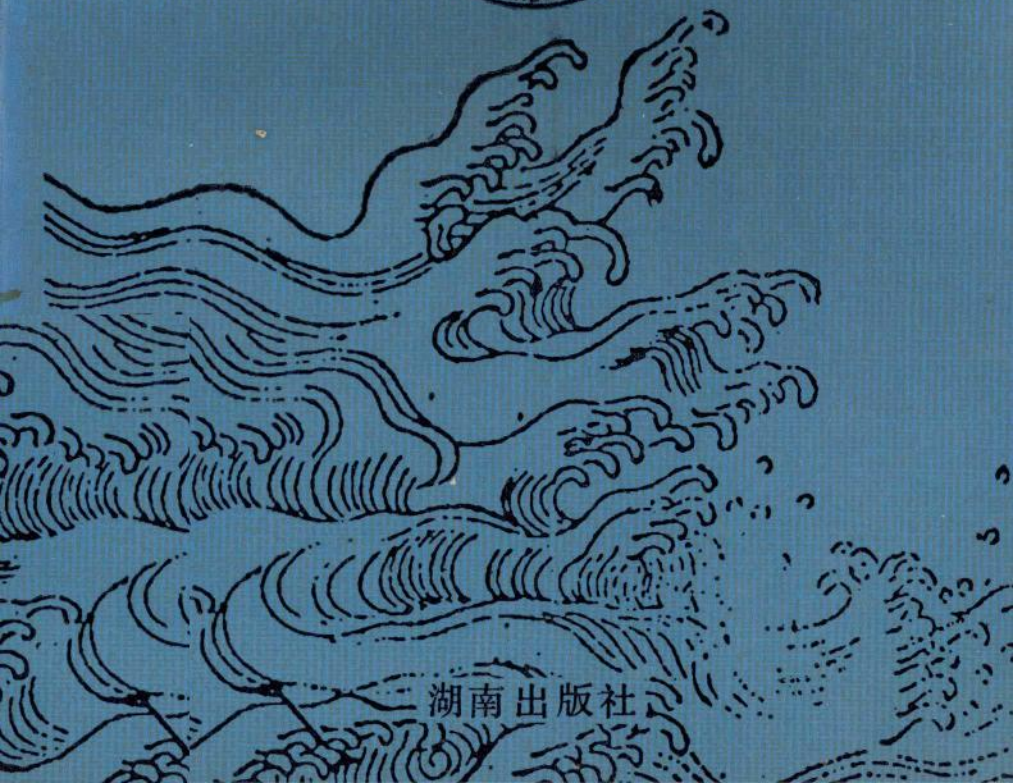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政治观 的批判总结

——王船山政治观研究

陈远宁 / 著



湖南出版社

中国古代政治观 的批判总结

——王船山政治观研究

陈远宁 / 著



湖南出版社

〔湘〕新登字001号

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
——王船山政治观研究

陈远宁 著

责任编辑：萧 元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21,000 印数：1—1,000

ISBN 7-5438-0382-8

D·72 定价：5.30元

序 一

张岱年

王船山（夫之）是明清之际的卓越思想家，他继承、发扬张横渠（载）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思想，在本体论、发展观、认识论、历史观等方面将中国古典唯物主义哲学推向新的高峰，在哲学领域作出了多方面的理论贡献。他以气本论的唯物主义观点对于宋明时代程朱、陆王之说进行了分析批判，其中也包含对于道家、法家与佛学以及汉唐经学的批判评论。可以说王船山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先秦、汉唐以及宋明学术作了一次批判性的总结。

王船山遭亡国之痛，因而对于政治问题亦甚关心、对于秦汉、晋唐以及宋明的盛衰之迹、兴亡之故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反思，从而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学说。对于任人与任法、德教与刑罚、治吏与养民、集权与分权等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明锐的全面的考察剖析。这些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精切评判，在今天仍有借鉴的价值。

王船山强调了“君子小人之辨”与“华夷之辨”，这二者都有两层意义。以贤愚善恶来分别君子小人，这是有一定重要意义的；以贵贱等级来分别君子小人，鄙视劳动群众，就陷于悖谬了。这表现了严重的阶级偏见。反对异族入侵中原，坚持本民族的主权不容侵犯，这是有一定重要意义的，但鄙视少数民族，把少数民族斥为夷狄，就陷于悖谬了。这表现了严重的民族偏见。船山提出“宽以养民”，实际上还是重视人民群众的。王船山痛惜汉族主

权的丧失，表现了坚定的民族气节。他严辨“华夷”，其沉痛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他主张汉族与少数民族互不侵犯，既反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也反对汉族对于游牧民族的掠夺。他是主张不同民族和平共处的。

王船山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民本主义，强调民为邦本。民本与民主二者之间有一定距离，但是本质上是相通的。与船山同时的黄梨洲（宗羲）的民主思想较船山为显著。但船山的民本思想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陈远宁同志精研船山之学，对于船山的政治思想钻研尤深。近著《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王船山政治观研究》一书，对于船山的政治思想作了系统的阐述。因他认为船山政治思想可以称为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故以“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为题。船山的政治思想散见于多种著作之中，陈远宁同志广泛搜求，融会贯通，扶精发微，得其要领，这是值得赞许的。远宁同志询问我的意见，于是略述关于船山思想的观感，以为之序。

1991年5月序于北京大学

序 二

傅白芦

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简称《风俗论》）一书里说：“若论伦理和治国之术，他们（中国人）在世界各国中，不仅资格最老，而且应居首位”。当时欧洲的思想界，对中国历史所知尚少，对中国封建制度及其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也因而或则滥事攻击或则词多溢美，不可能作出确切的评述。伏尔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种颇能符合历史实际的见解，堪称高明。

十分注重伦理和治国之术的研究，确实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大特色。不过，它不是象现代学科那样按学术性质而分的门类去从事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专门研究，而是大多通过史学来展示其成果。史官史家们，在记“言”载“行”叙“制”（制度）并将其编纂成书的过程中，常或评说史事，臧否人物，剖析因果，乃至议论风生。伦理和治国之术则贯穿此中矣。其目的，就在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现存的最古的史书——《尚书》，虽在编纂上尚“无定法”，而在其《商书》《周书》中却常透出以殷亡为鉴戒的意旨；由孔子根据鲁国史书删订的《春秋》，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在编纂上被誉为“有成例”。它的目的更为明显：“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它“以一字为褒贬”，既

能“常责备于贤者”，又可使“乱臣贼子惧”。看来，作用还很不小的。此风流播，形成传统，在编纂方法和体例上虽各不相同，但都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而伦理和治国之术就充盈其间了。中华民族似乎可说是非常注重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民族，又是容易遗忘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民族。在注重时，常常能够导致新王朝的兴起和昌盛；而在遗忘时，又常常可以诱发旧王朝的衰败和消亡。伦理和治国之术也就在历朝历代的盛衰兴亡之中，积累丰富的思想资料，成为支撑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的理论武器。因此之故，明智的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就为探究此道而孜孜不息。

17世纪中国的杰出思想家王船山，在饱经家国之变而又回天无力的情况下，还归故土，“决计于林泉”。他晚年的重要著作《读通鉴论》和《宋论》，就是继承中国史学的这种传统，在朱明王朝溃灭的新的历史情况下，从历代王朝的成败得失中再一次总结经验教训的成果。《读通鉴论·叙论四》，对“资治通鉴”四字所作的新解释，最能说明他致力于此的目的。他说：

“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为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炤之者也。”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

治乱得失之理，修齐治平之道，尽入此中。由此可见，《读通鉴论》和《宋论》，实质上是通过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阐述他对伦理和治国之术的见解。钱穆先生1983年所著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就觉察及此。他在《略论中国政治学》这一“目”中提出：

“观其最后著作读通鉴论、宋论两书，今人皆以史论目之，不知其乃一部政治学通论，于历代政治上之大得大失，以及出仕者之大志大节所在，阐发无遗。”是不是必须称之为“政治学通论”，姑且不说，不要把它们看作只是“史论”，当然是很有道理的。现在，陈远宁同志以这两部书作为最主要的依据，经过发掘爬梳整理，以“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为题概括其主旨，写成书稿，既较为完整地阐明了王船山对政治的认识和看法，又进行了具有系统性的研究，无疑是得当的；如果没有记错，它还是我国研究王船山政治观的第一本专著，因而更为可喜。

300年前辞世的王船山，仅从其政治观方面来看，与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等称颂的王船山，实在是大不相同；和维新志士谭嗣同倾慕的王船山，亦颇异其趣；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章太炎推崇的王船山，也是不尽一致的。各有所好，各取所需，由来久矣。当代严谨的学术工作者，是象后来的人们塑造王船山那样去研究船山，还是按照王船山的本来面貌去研究船山？如果决心按照科学的要求去取得科学的成果，首先就需要对此作出郑重的考虑，后者应该会是最佳的选择。

要按照王船山的本来面貌去研究他的政治观，需要充分掌握准确的第一手资料，《读通鉴论》和《宋论》自然必不可少，但仅此两书，恐怕还不能算是“充分掌握”，更广泛地搜求与此有关的、仍然是第一手的资料，势在必行。因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大抵都极为庞杂，他们几乎都是可称为学识渊博，通达古今的“通人”，明代学者更是大多矜尚广博，王船山恐难例外。如果只是依凭他的一、两部书，而要去真实地描述其本来思想，并借以作出

科学的判断，显然是难以奏效的。要发掘出他的政治观，首先就不能不同时考察其与之密切联系着的纲常伦理思想，说伏尔泰“堪称高明”，就是因为这位远隔重洋、对中国知之不多的法国思想家，已经敏锐地看出了中国的伦理和治国术之间的无法分割的关系。人们在研究船山的哲学思想时，不难发现他的本体论中也烙下了伦理、政治思想的印记；倘若探究他的经济思想，又可看到它常是从伦理、政治的角度提出识见的；即使吟读他的诗文，也可领略到其中抒发的对伦理、政治的兴味。因此，当代严谨的学术工作者，广泛涉猎船山的著作，运用中国传统的文史哲经综合研究的方法，又从多角度、多侧面将思维幅集于政治观这一结点上，去进行深入的探求，不会是不可取的。

王船山的政治观，绝不是随心所欲的自我发挥所致，只能是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所说的，“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形成。在诸子百家学说纷纷扬扬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儒法道佛四家的思想，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此或彼，或主或次，或深或浅，或显或隐，或积极或消极地影响着后世的思想家们；而后世的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诸如经济地位、家庭教育、自身经历、人际关系、世事的纷扰特别是剧变等等，又总是决定着他们对前辈遗存的思想资料的择取、吸收、批判和改造，从而形成自己的认识和观点。正因为形成的过程是如此复杂，究竟哪一家的思想最主要地、最明显地、最深刻地影响了王船山的政治观？哪几家的思想也对船山政治观的形成发生过作用？王船山的政治观与诸家思想有哪些联系和区别？它具有哪些自己的特色？就是需要深入探求，作出较为贴近船山本来面貌的回答的课题。近几年来，公诸报刊的一些专文，对此聚讼纷纭，这是解放思想带来的好现象，是繁荣学术之必需。只有林彪、“四人帮”以崇尚法家为名，大行无法无天之实，钦定王船山为法家，不容他人置喙，才是极不正常的。

它留给社会科学的沉痛教训就在于：不是把原则作为研究的最终结果，而是把原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不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及其联系中找出事实，而是任意挑选一些个别事例去论证先提出的原则，因而不可能取得能够经受时间检验的科学成果，只好象是在玩一场文字游戏，一场每逢风风雨雨之时，每因言重九鼎之人，就急急忙忙地去另找一些事例另换一个结论，以应“一贯正确”之需的游戏，由此招致人们的诟病，这个教训是沉痛的。只有与此种游戏彻底决裂，才有可能防止感觉或情绪支配自己；才有可能发现历史人物所提供的比其前辈和同辈进步的新的东西，发现他们的较之前辈和同辈还显得落后的旧的东西，也不会因为他们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去求全责备；这才有可能较为准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及其功过是非。

研究王船山的政治观，当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经过发掘整理，在恢复其本来面貌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其中有价值的东西。是否“有价值”，需要用先进的价值观去择取；“批判地吸收”，也需要用先进的思想去进行比较、鉴别和分析。笼统地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恐怕于事无济，错把糟粕当作精华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就是常用的“借鉴”一词，由于含意有些朦胧，也容易滋生歧义。“文化大革命”中，“借鉴”中国封建社会的“儒法斗争”，使用地主阶级巩固封建专制的统治之术，来巩固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就酿成了历史的悲剧。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和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性质完全不同而且截然相反的两种专政，巩固之道也必然是完全不同而且截然相反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如果希图“借鉴”封建专制的统治之术来巩固人民政权，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灾难性的。我们说从王船山的政治观中批判地吸收有价值的东西，实在需要有这样的思虑。

“借鉴”二字，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方为恰当，似有必要引起严谨的学术工作者的重视，含糊其辞，恐非所宜。冒昧地提出这个尚

未为学术界同仁广泛注意的问题，只是一个探求加强研究的科学性的愚者之一虑，也许是杞人之忧，为的是乞请方家指正。

以上所陈关于需要按王船山的本来面貌去研究船山的政治观等四点浅见，是对如何加强研究的科学性的思索，是否妥当，殊无把握。恰巧有幸两番拜读远宁同志的书稿，先是分章浏览，后是全书通阅，深深感到他的研究实践和我的粗浅的思索颇为相近，我只是这样想过，他却已拿出了成果，做出了成绩，实在令人欣羨不已。他督促我将思索形之为文字，“却之为不恭”，就贸然写了这些。倘若他的这部著作能够得到学术界的承认，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将证明这条探求加强研究的科学性之路是走得通的；倘若后果不是这样，他的研究成果就可在同志间的切磋琢磨中讹讹匡误，我也能借此而深获教益。这都是值得庆幸的。

1991年12月于长沙

目 录

序 一	张岱年(1)
序 二	傅白芦(3)
引 言	(1)
第一章 “公天下”思想	(6)
第一节 “公天下”概念的源起与发展	(6)
第二节 “论之不及正统”	(18)
第三节 “循天下之公”	(27)
第四节 论“均平”	(37)
第二章 集权与分权	(44)
第一节 古代社会中央集权制形成与加强的曲折过程和趋势	(44)
第二节 隋唐之制, 定建国之规模	(55)
第三节 君权与相权	(62)
第四节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69)
第三章 “人治”与“法治”	(78)
第一节 历史上三派观点的歧异	(78)
第二节 “治惟其人, 不惟其法”	(83)
第三节 “人治”之要: 亲贤远佞、善于纳谏、求诸己	(88)
第四节 “法治”之要: 从简、从公、从情	(98)
第四章 德教与刑罚	(104)

第一节	曲折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	(104)
第二节	先王之政, 德教为尚·····	(111)
第三节	风化之教与庠序之教·····	(119)
第四节	刑以佐礼, 辅礼以刑·····	(127)
第五章	养民与治吏·····	(136)
第一节	儒法道三家观点的异同·····	(136)
第二节	“征天于民, 用民以天”·····	(143)
第三节	“严者, 治吏之经”·····	(149)
第四节	“宽者, 养民之纬”·····	(158)
第六章	举贤才与养士·····	(167)
第一节	历史上用人唯贤与唯亲之争·····	(167)
第二节	“为国计无强之休, 任贤而已”·····	(177)
第三节	科举与贡举结合, 文行志统一·····	(186)
第四节	贵士、养士, 而不治士·····	(195)
第七章	论“民变”·····	(204)
第一节	古代的“民变”三论·····	(204)
第二节	“张角起而汉裂, 黄巢起而唐倾”·····	(214)
第三节	防治“民变”之策·····	(221)
第四节	船山“民变”观在实践中的“矛盾”与析疑·····	(230)
第八章	论“华夷之辨”·····	(238)
第一节	“华夷之辨”概念的源起与实质·····	(238)
第二节	“华夷之辨”——天下之“大防”·····	(246)
第三节	论制“夷”之策·····	(254)
第四节	船山民族观的逻辑一贯性·····	(262)
结语	·····	(269)
跋	·····	(274)

引 言

中国封建社会，绵延2000余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封建社会延续如此长久，根本上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而政治上层建筑在维护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过程中所发挥的顽强能动作用，亦显然不可忽视。从事实上看，中国历代封建阶级中有作为的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无不十分重视运用政治上层建筑的力量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调整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以保持封建制度的稳固与延续，在此过程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从理论上作了艰苦的探索，逐渐形成内容丰富、派别不同的政治观点，其中尤以儒家政治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经常的、主导的作用，成为自西汉中期以后指导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主要理论武器。

王船山作为封建社会末期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正是站在中小地主立场上，秉承儒家思想之大旨，以“坐集千古之智”的恢宏气魄，对中国古代各家各派政治学说进行深入的爬梳抉择工作。他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求顺于理，求适于用，求安于心，刻志兢兢，匠心独具，提出了颇具特色的政治观体系，成为集中国古代政治观之大成者。

王船山，又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生于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卒于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正是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面临“天崩地坼”、发生剧烈震荡的时代。

船山生于封建地主阶级书香世家，父亲王朝聘系饱学秀才，叔父王廷聘、长兄王介之、次兄王参之均汲汲于经学，船山自幼即习读儒家典籍。他7岁读完《十三经》；14岁考中秀才；23岁时，湖广提学高世泰岁试衡阳，列船山文章为一等，评语为“忠肝义胆，情见乎辞”；24岁考中举人，以《春秋》卷第一，名列第五。在家庭熏陶下，船山青年时期虽然走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对国家大事表现了热切的关心。当时正值国家多事之秋，明王朝自嘉靖以来，政权已日趋腐朽，且愈发展到后来愈益不可收拾。以皇室贵族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进行疯狂的土地兼并，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明史》说：“神宗赉予过侈，求无不获”，“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多至四万顷”，“熹宗时，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德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而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盖中叶以后，庄园侵夺民业，与国相终”^①；赋税奇重，吏治黑暗，贪贿风行。特别是崇祯时期，接受杨嗣昌建议，于一般赋税之外，又加额征收练饷、辽饷、剿饷，更使人民痛苦不堪。“嗣昌流毒天下，剿练饷多至七百万”“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万。”赋税奇重的直接结果是人民逃税，官吏里胥们便乘机“轻重其手”，从中进行敲榨勒索，致使“小民益穷蹙”^②；加上皇帝实行一人独裁专制，朝廷之内，依靠宦官处理朝政，朝廷之外，依靠厂卫实行特务统治，以致众多忠良大臣被诛杀，无辜百姓遭荼毒，冤狱遍及国中。上述种种极端凶残的剥削与迫害，使广大人民忍无可忍，为谋求基本的生存权利，被迫纷起造反，自万历至崇祯，数十年间，“民变”未尝间断，在四处爆发农民暴动的同时，又出现了市民暴动。其中尤以李自成、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声势最为浩大，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生存。面对这“民

① 《明史》卷七十七。

② 同上，卷七十八。

心如石炮，捻一燃而烈焰冲天，国势如溃瓜，手一触而流液满地”（吕坤语）的严重局势，王船山忧心如焚，他愤恨农民造反是大逆不道，更埋怨明王朝统治腐朽，招来“民变”之灾，迫切希望通过科举取仕为振兴王朝效力。为此目的，他不仅在研读史书时，悉心研究历代典制沿革，江山险要，士马食货，注重考察现实国计民生问题，且于1639年与好友管嗣裘、郭凤翥、文之勇等组织“匡社”，名为以文会友，实则意在匡时济世。1642年冬，王船山满怀报国之志，与长兄王介之一道首途北京参加会试，船行至南昌即因北上道路为农民起义军切断而未果此行，不得已于次年春天折返衡阳。科举取仕幻梦的破灭，加深了他对农民起义的敌视。1643年，张献忠率领大西农民军攻至衡阳，曾慕名招请王船山加入义军，共举大事，王船山“髡面刺腕”予以拒绝，逃至南岳黑沙潭，作《九砺》一篇，声言不能容忍“从贼者斥国为贼”“恨不与俱碎”。1644年，李自成率领大顺农民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旋因政策失误，仅仅四十天，即被吴三桂勾引清兵打败，清世祖福临入关后，建立了满、蒙贵族和汉族大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清王朝，且为扩展其胜利，巩固其统治，实行一系列诸如“薙发”、“圈地”、“严禁逃人”等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尤其是在向江南进军过程中，先后进行了“血洗江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空前残酷的民族大屠杀，这一切，对于素抱忠君爱国之心的王船山来说，不啻是一场噩梦。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互交织，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形势下，王船山放弃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毅然投身反清复明的实践斗争。1646年，他以一介书生，由衡阳出发，只身前往湘阴，上书巡抚章旷，“指画兵食”，提出调和抗战派将领何腾蛟与堵胤锡的矛盾，“以防溃变”，以及利用农民军力量共同抗清的主张，奈章旷不予采纳，遂失望而归；继而又于1648年与好友管嗣裘、夏汝弼、僧性翰等在南岳方广寺举兵抗清，又以势单力薄、叛徒告密而惨遭失败；事

后，又辗转奔波至肇庆投奔南明永历朝廷，希图再酬匡复之志，无奈永历朝廷依然昏庸腐败，宦官权臣当道，吴党楚党争斗激烈，王船山从大局出发，曾义正辞严，三次上疏弹劾吴党首领、权臣王化澄，不意正义之举非但未获永历帝支持，且反遭王化澄以“百梅恶诗”案诬陷，“将构大狱”，险些丧失性命，幸赖原大顺军首领、降帅高必正奋力营救，方得免于难；自此以后，王船山目睹永历朝廷振兴无望，势不可回，才于1651年满怀忧愤心情携眷还乡，“决计于林泉”，从事著述，从思想理论上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特别是明王朝覆亡的经验教训，为反清复明、振兴汉民族的封建天下提供理论武器。

王船山一生著述等身，涉及哲学、经学、历史、政治、文学、乃至经济等各个领域，其所有著述的显著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政治实践性，也就是说，他所撰著作，大都深深植根于现实的或历史的政治实践之中，同时又着眼于现实的和未来的政治斗争。他研究哲学，鲜明提出其宗旨是要“尽废古今玄妙之说而返之实”^①，批判“害风俗以陆沉天下，祸烈于蛇龙猛兽”的老庄佛家之说和陆王心学，探求一条求实的思想路线。他研究历史，明确提出其要旨是要“述往以为来者师”^②，特别是要“惩明之亡”，“哀其所败，原其所剧”^③。他研究经学，极力反对咬文嚼字、寻章摘句的空疏学风，强调要联系实际，对传统思想予以批判、继承和创新，要“六经责我开生面”，“推故而别致其新”。他研究文学，也重视运用文学的艺术形式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感情，唤起人民的觉醒。人们常说，王船山是伟大的朴素唯物主义者，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首先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思想家，这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由于王船山的各种著作都浸透着政治实践精神，因此，研究其政治思

① 《姜齐公行述》。

② 《读通鉴论》卷六。

③ 《黄序·后序》。